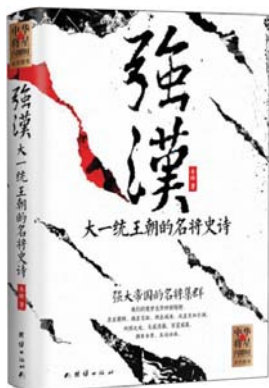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刘涛 著
《告示榜文与明代社会治理》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朱晖 著
《强汉：大一统王朝的名将史诗》
团结出版社

□高金霞

在明代，你若走在大街上，隔三岔五就会看到告示。县衙门口有，村镇粉壁上，石碑上也有。白纸黑字，朱红大印，抬头就是“示仰”二字，意思是“下面的话你们都听着”。这些告示内容五花八门，有的让人笑掉大牙，有的让人心头一热，有的则让人忍不住骂一句“瞎折腾”。刘涛的新著《告示榜文与明代社会治理》，专门研究这些老告示，读来颇有意思。

先说一则笑话。明代有个衙门叫行人司，听着清贵——“非科甲不选，非王命不行”，好像挺尊贵。实际上呢？行人司衙门孤子，连个隶役都没有。官署大堂下有一口井，井水甘冽，附近老百姓都来打水。更有胆大的妇人，打完水不走，竟大摇大摆地登上公座，在上面缠起小脚来。当时有位文士看不下去，模仿行人司行人的口气写了则告示：“示仰邻居担水妇人，不许擅登公座上缠足。如违，本官亲咬三口。”这则告示出自沈德符的《万历野获编》，当时就被传为笑谈。

跟这则“咬三口”形成对比的，是朱元璋的大白话告示。朱元璋明白，告示写得再漂亮，不如百姓听得进去。他在全国各地建“申明亭”和“旌善亭”，做了坏事，写明罪状贴在申明亭上；行了善、尽了孝，名字上旌善亭，传誉乡里。说白了，就是古代的“红黑榜”。他另设“木铎老人”，每月六次走村串户，摇着木铎高喊“孝顺父母，尊敬长上、和睦乡里，教训子孙，各安生理、毋作非为”。这二十四字的“圣谕六言”，堪称明代最深入人心的宣传口号。

明代的告示里，还有不少颇具“现代眼光”的内容。成化十年(1474年)，明宪宗命提督九门内官巡视城池，出榜禁约沿河居民“毋得秽污”——就是不准往护城河里倒垃圾、排污。这大概是明代最早的“环保告示”了。同样务实的还有海瑞。他在淳安县当知县时，发现底下人征收钱粮时巧立名目多收“火耗银”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海瑞直接贴出《定耗银告示》，耗银一律加收二分，一钱加二厘，一两加二分，明码标价，不许多收。穷乡僻壤的老百姓，再也不用怕被收钱的人忽悠了。

在告示中，还有很多教化百姓，劝化风俗的内容。明代不少地方好饮成风，有

人喝了酒就到衙门撒泼，“虽至县庭，犹乘醉妄言，甘心受责”。为了制止饮酒之风，慈溪县知县薛应旂在《晓谕齐民》告示中规定：县前直街的酒铺一律不许卖酒，改卖饭，“如有犯者，著地方总甲送县惩治”。这一手“釜底抽薪”，够狠。赌博更是官府严厉打击的对象。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吕坤说得明白：赌博是“败家之源、做贼之根”，开场子的好比窝主，赌博的好比盗贼。他主张在各州县乡村印贴告示，悬赏捉拿赌棍——“拿获真正赌博者，追银十两充赏”。

而有些告示，不仅无用，还很荒唐。正德十四年(1519年)，明武宗下“禁猪令”“违者发极边卫分永远充军”。老百姓吓坏了，赶紧把猪杀光，小猪崽也被掘地埋掉。最后，由于百姓的不满，朝臣的极力劝谏，这一禁令在施行不到三个月便疾而终。万历年间，某官员禁止捕蛙射鸟，衙役趁机四散下乡讹诈，“每遇渔舟，辄诬为捕蛙”，搞得民不聊生。难怪当时有人感叹道：“榜文告谕遍满垣壁，天下几困于文法，而绝无实用于民时，人之谓故纸世界。”

不过，灾荒年间的告示，那真是救命的。万历十四年(1586年)，河南先旱后蝗，蝗蝻啃得庄稼只剩秆子。巡抚急出告示：“每打蝗蝻一斗，即给仓粟一斗。”老百姓一听说有粮换，连夜下地扑蝗，几天工夫，诸县蝗虫灭尽。灾荒缺粮时，官员出榜沿途市井，欢迎南方粮商运米北上赈济，许以“米至二百石以上赐敕奖励”“复其身役”等优惠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用市场手段解决粮食短缺问题。

读完刘涛的这本书，你会发现，一张张泛黄的告示背后，藏着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治理逻辑，更是几百年前的官民互动、世道人心。全书以告示榜文为中心线索，不仅系统梳理了明代的告示榜文制度，还深入分析了告示榜文在吏弊防治、赋役征派、风俗教化、基层治安、灾荒赈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。同时，客观揭示了告示榜文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虚文搪塞、奉行故事、实效不足的治理局限，立体还原了明代国家与社会、官府与民众之间真实而复杂的互动图景。这种兼顾正面效能与现实局限的辩证审视，使研究更具历史质感与思辨深度。

□王淼

通俗历史作家朱晖的新著《强汉》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，书中写及的是西汉时期的七位名将：周亚夫、李广、卫青、霍去病、李陵、赵充国、陈汤——题材是西汉名将传记，内容却涉及从汉文帝至汉成帝，西汉一百五十多年间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状况。作者其实是以这七位名将的个人经历，串联起西汉鼎盛时期的宏大历史，分析其间利弊，总结个中得失，进而点评这七位名将的军事才能、政治智慧和命运，无异于一部西汉鼎盛时期的断代史。

西汉王朝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“汉”为国号的大一统王朝，西汉时期之所以名将辈出，首先是与西汉王朝恢弘的气势和雄厚的国力分不开的。朱晖认为，如果将春秋战国比作少年时代，那么秦末楚汉则是这个少年的青春阵痛期，而到了汉代就意味着这个少年已经发育成熟，正式进入了大刀阔斧、锐意进取的青年时代。陈汤在他的奏疏中称这个时代为“强汉”，而包括陈汤本人在内的七位名将，其实正是强汉结出的果实。换句话说，周亚夫等七位名将原是在强汉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脱颖而出的，他们不仅是强汉军事领域的杰出代表，同时更是西汉王朝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；他们是一个王朝的中流砥柱，他们的个人命运，也折射出一个王朝的兴衰与沉浮。

在西汉的七位名将中，卫青和霍去病无疑是两颗最为璀璨的将星。他们二人均出自底层，其中卫青一生七次出击匈奴，收河南，置朔方，破真颜，袭王庭，创造了“全甲兵而还”的战争史奇迹。而霍去病打仗向以速度快著称，他常常在最不可能的时间，出现在最不可能的地点，其用兵堪称神鬼莫测，难以捉摸。霍去病十八岁那年一战封侯，“断匈奴之右臂，张中国之左腋，扬汉家之武威”，成为西汉名将中因战功封侯的特例。卫青稳中求胜，以战养战，霍去病无坚不摧，唯快不破，二人双剑合璧，成为强汉的象征。

周勃是刘邦明确指定的“安刘氏者”的关键托孤人物之一，当“诸吕之乱”爆发时，正是周勃不负重托，以雷厉风行的手段诛灭诸吕，协助汉文帝登上了帝位，却也因此遭到汉文

帝的猜忌，先是将周勃免职，继而将他下狱，深受酷吏之苦。与老父相比，其子周亚夫的命运更加悲催，他虽然以治军严明一举成名，继而横刀立马，只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便平定“七国之乱”，却因为反对废立太子，违逆了汉景帝，终遭罢相，随后不久身陷囹圄，最终绝食而死。

作为怀才不遇的代表人物，李广难封，向来是西汉以降所有心怀大志，却郁郁不得志的文人战士们内心的痛。在漠北之战中，李广担任前军将军，却因中途迷路而未能参战，不但寸功未立，反而获罪自杀，留下千古遗憾。朱晖认为，李广难封，固然与时势相关，但他个人性格的缺陷，才是铸成他悲剧命运的最大原因。李广家族的另一个悲剧人物是李陵，他是李广的嫡长孙，年轻时“常思奋不顾身，以殉国家之急”。他第一次独自带兵出战，即以五千步卒遇上匈奴的主力。面对匈奴八万骑兵的围攻，李陵带领着这支偏师与之周旋多日，杀敌过万，最终兵尽矢穷，李陵本人力竭而降。据司马迁考证，李陵投降匈奴并非惜死，而是“欲得当以报汉也”。然而，汉武帝最终还是将李陵一家老小满门抄斩，彻底断绝了李陵的归汉之路，令后人唏嘘不已。

在西汉的诸多名将中，赵充国无疑是存在感最低的一位。他是西汉名将中的另类，别人打仗是为了建功立业，他却尽量不打，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，就决不诉诸武力。赵充国年过半百才得到汉宣帝的重用，他在平羌大战中一战成名，使用的是一种分化瓦解、剿抚并用的战术，使得羌人不敢而降。赵充国对匈奴用兵也是如此，主要策略是以屯田的方式逐渐压缩匈奴的生存空间，把匈奴逼进绝境，从而彻底解决帝国北方的边患。与赵充国相比，陈汤最大的贡献就是大胆矫诏调集胡汉联军，深入西域一万余里，一举攻破郅支城，斩首单于，一战树威，终结了汉匈百年战争，让强汉的天威远播中亚，堪称历史上最伟大与最成功的一次远征。

如果说赵充国的战略体现出的是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战争最高境界，那么陈汤的远征则以实际行动宣告了“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。他们其实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，诠释了名将的价值和战争的涵义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《强汉》里的大汉名将

【故纸堆里】

明代官场「告示」那些事儿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齐鲁晚报

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

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.1克。



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